

刍议肾气丸及其类方之源与变

莫陶然*, 张哲#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病一科, 黑龙江 哈尔滨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5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3日

摘要

肾气丸及其类方构成了中医补肾法度的核心体系, 然其源流繁复, 古今同名异方、同方异名现象普遍, 尤以今之“金匱肾气丸”与“桂附地黄丸”在名实对应上最易混淆。本文通过系统梳理《金匱要略》《小儿药证直诀》《严氏济生方》及《景岳全书》等关键中医古籍的文献记载, 厘清肾气丸自东汉至明清时期在方药组成、剂量比例、主治证候及配伍理论等方面的动态演变过程, 旨在为现代临床精准辨识与运用补肾类方提供文献基础与理论支撑。

关键词

肾气丸, 类方衍变, 方药考证, 经典名方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Shenqi Pill and Its Analogues

Taoran Mo*, Zhe Zhang#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I,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rbin Heilongjiang

Received: April 23, 2026; accepted: May 25, 2026; published: June 3, 2026

Abstract

The Rehmannia Decoction and its related prescriptions form the core system of the TCM method of tonifying the kidney. However,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re complex, and the phenomenon of different prescriptions with the same name or the same prescription with different names is common in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mong them, the “Jinkui Rehmannia Decoction” and “Cinnamon and Aconite Rehmannia Decoction” of today are the most confusing in terms of name and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莫陶然, 张哲. 刍议肾气丸及其类方之源与变[J]. 中医学, 2026, 15(6): 1-6.

DOI: 10.12677/tcm.2026.156305

reality correspondenc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literature records in key ancient TCM classics such as *Essential Prescriptions from the Golden Cabinet*, *Direct Decisions on Pediatric Medication*, *Jisheng Fang*, and *Complete Works of Jingyue*, and deeply clarifies the dynamic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Rehmannia Decoction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erms of its composition of herbs and ingredients, dosage ratios, main indications, and compatibility theories, aiming to provide a solid literature basis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recise iden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onifying kidney prescriptions in moder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Shenqi Pill, Evolution of the Class Formula, Verification of Prescriptions, Classic Famous Prescrip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当代中医学学术界与成药市场中,“肾气丸”之名应用极广,但其实际指代的方剂却常陷入名实不符的困境。例如,当今通行的“金匱肾气丸”成药,临床上多按温补肾阳、化气行水之剂来理解,其药味结构也常与严用和《严氏济生方》所载加味肾气丸(后世通称济生肾气丸)相互参照[1]。然而,若溯源至东汉张仲景《金匱要略》原方,则肾气丸的核心配伍为“干地黄”与“桂枝”[2],其制方思路重在少火生气、阴中求阳,与后世单纯强调“大辛大热、温补肾阳”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

随着历代医家的临床探索与理论创新,肾气丸的方源不断繁衍,逐步衍生出六味地黄丸、济生肾气丸、左右归丸等重要类方,并在肝肾阴虚、阳虚水泛、精血亏损等不同证候中形成各自较为稳定的适应范围。肾气丸类方的流变,绝非简单的药物增减,而是深刻反映了中医学术思想由综合调摄向专病专证化发展的轨迹。基于此,本文拟系统梳理肾气丸及其类方在历代医籍中的流变脉络,考察其组成、剂量、主治方向与配伍机理,从而厘清这一经典名方在历史长河中的衍变之理。

2. 肾气丸之方证源流

2.1. 组成与剂量考证

肾气丸之祖方,首见于东汉张仲景所著《金匱要略》。该方在《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及《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等篇中均有论及。其原始组成与剂量为“干地黄八两,薯蓣(山药)四两,山茱萸四两,泽泻三两,茯苓三两,牡丹皮三两,桂枝一两,附子(炮)一两”,八味药的特定比例(8:4:4:3:3:3:1:1)构成了后世诸方衍变的原始模型。方中以干地黄为君,辅以山茱萸、山药为“三补”;又以泽泻、茯苓、牡丹皮为“三泻”;少佐桂枝、炮附子,以微微生发少火,振奋肾气而助气化,并非以峻烈之品直折阴寒。全方补中寓泻、阴中求阳,体现出仲景制方的平衡思维[2]。

唐宋时期,此方广泛流传,后世多以“崔氏八味丸”称之,《外台秘要》已有相关收录,其药物结构大体仍与《金匱》所载一致[3]。至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桂枝”在文字表述上逐渐出现“桂心”乃至“肉桂”的替代趋势,提示后世在药物归类和临床取向上已开始发生细微偏移[4]。再至明清,随着

炮制工艺与临床习惯的演化,原方中的“干地黄”多被熟地黄取代,此一变化不仅增强了填精补血之力,也使全方性味由清润平调逐渐趋向于厚腻温补。

2.2. 主治及配伍探微

在《金匱要略》的论述中,肾气丸所治证候虽涵盖虚劳腰痛、痰饮短气、消渴、转胞等多种病症,但其核心病机均可归于“肾气亏虚,气化失常”[2]。其中,“小便不利”与“消渴小便反多”看似相反,实则同属膀胱开阖失司、气化不行之变:开之不及,则水液停蓄而为痰饮水肿;阖之无权,则津液下泄而见尿多消渴。仲景以肾气丸统治此类双向症状,其要点正在于通过补肾气而恢复动态的气化功能,而非单纯利尿或止遗。

然而,随着后世将“干地黄”多易为“熟地黄”、“桂枝”多易为“肉桂”,方剂的整体重心便由“温通阳气以助气化”逐渐转向“温补命门以祛阴寒”[5]。故后世普遍认知中的肾气丸主治,常被归纳为腰膝冷痛、畏寒肢冷、小便不利等典型肾阳虚证[6]。原方中“气化”这一动态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被“温补”这一性质化表述所覆盖,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医家对肾脏生理病理认识重心的变化。

2.3. 原方与类方辨析

若进一步考察肾气丸自仲景以后之演化路径,则可发现其后世分化并非单纯源于药味增损,而是根植于病机理解、临床对象与治法取向的多重转移。换言之,肾气丸之所以能够成为后世补肾诸方的重要源头,恰在于其原方结构本身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与延展性。仲景所设肾气丸,虽以“补肾气”立意,但其配伍并不拘泥于单向温补,而是通过“三补三泻”与少量桂附相配,使滋阴、助阳、化气、行水数重作用兼而有之,形成一种相对均衡而富于弹性的基础结构。正因为这一结构并不偏执于某一端,故后世医家得以根据不同证候重点,从中抽绎出滋阴、温阳、利水、填精等多种治疗方向。

从临床病机的层面看,仲景原方所统摄者,主要是“肾气亏虚,气化失常”这一相对综合的病理状态。此类病机既可表现为小便不利、水液停蓄,也可表现为消渴而小便反多,其核心不在单一之寒、热、虚、实,而在肾失开阖、气化失司。然至后世,随着辨证体系逐渐细密,医家往往不再满足于以“肾气不足”笼统概括诸证,而更倾向于进一步区分其中偏于阴虚者、偏于阳虚者、偏于水湿壅滞者,以及偏于精血大亏者。于是,原本兼顾阴阳、补泻并施的肾气丸,便逐渐沿着不同的病机重心发生分流:或去其温阳之品而专事滋阴,或增其温化之力以强化行水,或进一步去泻存补,以应对久病虚损之重证。

因此,理解肾气丸及其类方的关键,不应停留于“原方加减了哪几味药”的表层比较,而应看到其背后所反映的病机重构与治法选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肾气丸的流变史并不是某一固定处方的简单繁衍,而是一条由经典方义不断被诠释、拆解、强化并再组织的学术发展脉络。

3. 类方衍变

自仲景确立肾气丸的经典地位后,历代医家为适应不断发展的临床需求,对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化裁,逐步形成了滋阴补肾、温阳利水、纯补阴阳三条较为清晰的衍变脉络。

3.1. 滋阴补肾一脉:钱乙之奠基与后世专科化拓展

肾气丸在宋代的化裁,标志着中医补肾理论由兼顾气化向更重滋阴填精的一次重要转向。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中提出“小儿纯阳,无须益火”,又谓“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从临证实践上强调小儿脏腑娇嫩、阴津易伤,故对于小儿肾虚证不宜妄投辛温燥烈之品。基于此,其在仲景肾气丸基础上去桂枝、附子而存六味,后世遂称六味地黄丸[7]。

这一“去桂附”的化裁,不仅是药味的减法,更意味着配伍重心的转移:原方“阴中求阳”的综合结

构, 经此调整后更突出于滋补肾阴。六味地黄丸延续了“三补三泻”的基本框架, 通过补肝、补脾、补肾与泻湿、泻浊、泻火相互配合, 构成补而不滞、滋而不腻的稳定模型。此后, 该方又衍生出知柏地黄丸、杞菊地黄丸、麦味地黄丸等一系列变方, 实现了对阴虚火旺、肝肾不足、肺肾两虚等兼证的细化覆盖。

3.2. 温阳利水一脉: 严氏加味与通利功能之强化

肾气丸演变的另一重要分支, 在于对其“化气行水”功能的强化, 而以南宋严用和的贡献最具代表性。严氏在《严氏济生方》中, 针对肾虚水泛、小便不利、肢体浮肿等证, 于原方基础上加入牛膝、车前子两味药, 创制“加味肾气丸”, 后世多称“济生肾气丸”[1]。其中, 牛膝补肾强腰且引药下行, 车前子通利水道而利尿通淋, 两药与原方桂附相配, 使温阳化气、行水消肿之力更为突出。

这一脉络的演进, 体现出中医临证思维由普适调理转向针对水液代谢障碍的专门治疗。与此同时, 随着药理学认识的深化, 后世在此脉络中又多将“桂枝”固化为“肉桂”, 意在利用其气厚味重、长于补火助阳的特点, 为温阳利水提供更持久的动力之源。这种由“温通”向“温补”略有偏移的取向, 也进一步加强了此类方剂在阴寒水肿重证中的适用性。

3.3. 纯补阴阳一脉: 张景岳之革新与峻补之开创

明代张景岳对肾气丸体系的重构, 标志着补肾方剂理论进入更强调真阴真阳与命门水火的阶段。张氏尤其重视命门真阳, 提出“善补阳者, 必于阴中求阳; 善补阴者, 必于阳中求阴”, 并据此对肾气丸“三补三泻”的经典结构作出新的取舍。其理论要旨并非单纯增热助阳, 而是在重虚久损之证中, 主张通过填精培元、阴阳互资以复其根本。

在此思想指导下, 张景岳通过对肾气丸及其衍生方六味地黄丸的深刻化裁, 创制了左右归系列方剂。右归丸(饮)在温阳基础上去泽泻、茯苓、牡丹皮等“三泻”药, 并加入鹿角胶、菟丝子、杜仲、枸杞子、当归等血肉有情及温润之品, 以“益火之源”而培补元阳; 左归丸(饮)则在滋阴基础上同样去“三泻”, 配伍龟板胶、鹿角胶、枸杞子、牛膝等药, 以“壮水之主”而培补元阴[8]。此种“去泻药、添精血”的演进路径, 使肾气丸类方由平补气化进一步转向纯补峻剂的新阶段。

综上所述, 肾气丸后世诸方之所以会呈现“同源而异流”的局面, 关键并不只在于药味的增损, 更在于医家对“肾”之功能重心的理解逐步发生了转移。仲景原方所着眼者, 是肾主封藏而又司气化, 故以三补奠其阴精之本, 以少量桂附振其生生之机, 再辅三泻使补而不滞、温而不燥, 其治法本质上是一种兼顾精、气、水三者动态平衡的复合法。至宋以后, 随着儿科、虚劳、水肿等病证辨治日趋专门化, 医家在临床上更强调某一核心矛盾: 若以阴精不足为主, 则去桂附而守六味; 若以水湿壅滞、下焦不利为著, 则增牛膝、车前子以导其下行; 若见真阴真阳两亏、久虚难复, 则又进一步舍去“三泻”而专事填精培元。由此可见, 肾气丸类方的演变, 并非简单的“原方加减史”, 而是补肾法由综合调摄走向分向专治的理论展开史。换言之, 后世各家所争论的, 并不是是否“补肾”, 而是究竟应当从何处着手以复其肾中生机: 偏于滋阴, 偏于助阳, 抑或阴阳并培、以求根本。理解这一层递关系, 既有助于澄清“金匱肾气丸”“桂附地黄丸”“济生肾气丸”等名称混用所造成的概念混乱, 也能为当代临床在辨识气化失司、阴精不足、阳虚水泛等不同病机时提供更为清晰的方证分野。

4. 核心药物变化之理

类方体系的宏观演变, 均深深根植于核心药物的微观变迁之中。

4.1. 地黄之辨: 由“干”转“熟”的重心位移

仲景原方必用“干地黄”(今之生地黄)。据《神农本草经》载, 其“味甘寒……填骨髓”, 偏于清润,

长于清热凉血、养阴生津[9]。宋代之后, 随着九蒸九晒工艺的成熟, “熟地黄”取而代之。熟地药性转温, 味极厚腻, 功专滋阴补血、填精益髓。这一基原与炮制的改变, 使得方剂的填精之力大增, 但凉血清虚热之功锐减, 且全方滋腻碍胃之性显著增加, 标志着补益方向从“清润”走向了“厚填”。

4.2. 桂之演替：从“通阳”到“补火”的偏移

原方所用“桂枝”乃嫩枝, 性轻扬升散, 长于发汗解肌、温通经脉、助阳化气, 其在方中重在“通”与“动”。自宋代起, 逐渐被干皮“肉桂”取代。肉桂气沉味厚, 性大热, 长于补火助阳、引火归元, 重在“守”与“补”。这一药用部位的置换, 从侧重“温通阳气以恢复气化运行”转向“温补命门真火以祛除沉寒痼冷”, 完美契合了后世医家将肾气丸定位于“温补肾阳”的临床诉求, 是核心功效偏移的最直接药理学证据。

4.3. 附子之变：炮制精进与剂量权衡

仲景用“炮附子”仅一两, 遵循“少火生气”之旨, 防其劫耗阴液。后世温补派因重阳气, 常突破此轻量限制, 加大附子用量以救逆回阳。更为关键的是, 附子炮制工艺由汉代的火“炮”发展出盐附子(引药入肾)、黑顺片、淡附片等多种规格。制法的精进既降低了乌头碱毒性, 又微调了药性归经, 为临床灵活掌控从温和助气到峻补回阳的不同治疗强度提供技术支撑。

5. 小结

肾气丸及其类方跨越近两千年的衍变史, 本质上也是一部补肾理论不断分化、深化与重组的学术演进史。其演变动力, 一方面来自临床证型的细分, 要求方剂由普适调和走向分项专治; 另一方面则来自不同历史时期主流医学思想的更迭, 如儿科用药观的形成、命门学说的发展以及温补学派的成熟。

本文所揭示的“同源异流”逻辑表明: 肾气丸诸类方虽均以“补肾”为共同基原, 却在补阴、补阳、补气之侧重点上, 以及“寓泻于补”与“纯补无泻”的方法论上呈现出明显差异。核心药物的嬗变——如地黄由干趋熟、桂由枝趋皮、附子由轻投趋于精制增效——并非偶然的经验堆积, 而是学术思想演变的物质表现。

正本清源的最终目的, 在于服务当代临床辨治。由本文考证可见, 肾气丸类方至少应从方源与方证两个层面加以区分: 仲景肾气丸重在“肾气亏虚、气化失司”, 其用桂附在于少火生气、助气化运行; 六味地黄丸由去桂附而来, 适宜从肝肾阴虚、阴精不足的方向理解; 济生肾气丸因增牛膝、车前子, 重点转向阳虚水泛、水湿下趋不利; 左右归丸则是在久虚重证中舍泻从补, 偏于真阴真阳亏损的填精培元。因此, 临床辨用时不宜仅以“温补肾阳”概括“肾气丸”一名, 而应结合具体版本、核心药物变化及病机侧重, 建立“方名-方源-药物组成-主治病机”的对应关系, 以减少“金匱肾气丸”“桂附地黄丸”“济生肾气丸”等名称混用带来的误判。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研项目(ZYW2024-050)。

参考文献

- [1] 严用和. 严氏济生方[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2.
- [2] 张仲景, 赵立凝. 金匱要略[M]. 广州: 广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
- [3] 王焘, 林亿. 外台秘要方[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 [4] 太平惠民和剂局.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

- [5] 耿连岐, 朱艳. 金匱肾气丸从“温补肾阳”到“补益肾气”探讨[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5, 21(10): 1307-1308.
- [6] 张家玮, 鲁兆麟. 金匱肾气丸方义探讨[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5(6): 12-15.
- [7] 钱乙, 古典医籍编辑部. 小儿药证直诀[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3.
- [8] 张介宾. 景岳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4.
- [9] 孙星衍, 孙冯翼, 柳长华, 等. 神农本草经[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20.